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

莫砺锋 编

神女之探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

神女之探索

——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

莫砺锋 编 尹禄光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扉页题签 程千帆

神女之探寻

——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

莫砺锋 编

尹禄光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 本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2 印张 10.125 字数 225,000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5325-1582-6

1·929 定价：8.30 元

序 一

〔美〕史蒂芬·欧文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已经汗牛充栋了，再过半个世纪，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内的积累将使图书馆不堪其重负。如果想证明在书林中再增添一本西方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译文集确有其理由，那么这本文集必须要呈献一些与我们的中国同行们不同的观点。

西方学术界何以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最通常的理由是为了证明西方的文学批评适用于中国诗歌。尽管本书中许多文章明显地受到了西方文学批评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本身既无独特之处，也并非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一方面，西方的批评在中国日益流行，而且人们按中国文学传统的需要对它作了明智的修改。另一方面，西方的批评本身也决不能保证提供新的见解：人们固然利用它作了一些出色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研究是令人厌烦的、生搬硬套的，甚至不可思议地对诗歌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

一篇文章中最有趣味、最有价值的方面常常是它所体现的思维习惯：提出了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思维习惯”部分地带有个人的色彩，但也都反映着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与中国同行一样地热爱中国文学，并乐意为此献身。但

是我们从事教学、研究的环境却与中国学者的环境迥然不同。我们的工作有许多不利条件。首先，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人数很少，而他们各自的专业范围又往往相去甚远。这样，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学领域内，我们都没有一大群可以与之讨论，并且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对我们的文章作出反应的同行专家。其次，我们的教学工作的要求更使我们无法变得非常的专门化，甚至在研究生课程中我们也不得不在很短的时期内讲授一段很长的文学史。第三，我们的教学经常要求我们向从事其他专业的、对中国文学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的学生和同事解释自己的工作，甚至在研究生课程中也必须把最基本的问题与高深的问题掺在一起。

每一种不利条件同时又是一种机会，使我们能够发现隐藏在这种不利条件之中的有利条件。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向我们的中国同行们呈献一些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东西，那总是产生于当我们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的时刻。也许这是最有价值的要求，同时也是最烦琐可厌的要求：总是需要从头开始解释重大的问题和微小的细节，总是需要在较大的背景中考虑个别情形。与我们在中国的同行不同，我们对自己的学生或读者很少能说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文章似乎“理论色彩”较浓，这常常是由于我们需要把中国文学置于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并亲临其境的背景之中。

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那些最优秀的中国同行们的学问之深是我们无法企及的。即使我们偶然地达到了那样的深度，在西方也只能孤芳自赏。我们所处的环境逼着我们以广度代替深度，我们常常必须使自己的研究范围涵盖整个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或中国学的几个学科。

由于被迫在一个广阔的领域内进行研究，一些意料不到的联系和联想就形成了。对于我们这些同时教授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人来说，这一点更是千真万确。这里所说的不是“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中人们是有意识地把两种不同的传统放到一起，而这里所说的却是联想和意料不到的观点自然产生的方式。我相信，这些偶然产生的联想虽然毫无系统，还是要比任何有意识地把两种传统中的作品所做的比较深刻得多。我常给学生讲一个故事：当我在耶鲁大学任教时，有一个学期我教一门西方文论史课程和一门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班讨论课，正巧这两门课被排在同一天。由于在这两种传统中文学理论的内容是如此的不同，我想把它们在我心中隔离开来。于是，当我从一个教室走向另一个教室时，我总是试图尽快地忘掉在刚才的课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切，并把观点转向下一门课程。我当时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在一种传统自身的背景中理解其文本是明智的。然而，既然是同一个人——我——在讲授两种传统（我无法在大脑中筑起一堵墙），彻底的隔离是不可能的。虽然我没有硬要作什么比较或提出什么观点，我对每一种传统的文本的理解仍无法避免受到另一种传统的影响。在我心里，既有一个传统的中国批评家在读席勒，又有一个西方的批评家在读刘勰。这不是“比较批评”，也不是“运用”中国的或西方的批评方法于另一种传统，后者很可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普遍的条件——在同一天教两门课，把两种传统带到一起来了。

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所有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都是用的这种方式。我们的环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我们必须与之交谈的学生和同事，自然形成了我们探讨中国文学的一种方式。当这种方式处于最佳状态时，它能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颖的观点，既不离奇，也不牵强。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哈佛大学

(莫砺锋 译)

序 二

莫 砺 锋

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是不受国界限制的，“精骛八极”、“视通万里”的诗神尤其喜欢到世界各地去漫游。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西方的缪斯早已降临华夏大地，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钟爱。中国的诗神虽然较为拘谨、内向，但也已越过重洋，去羞怯地轻轻叩击西方人的心扉。如果说一般的西方读者仅仅通过译文约略地窥见了东方诗神的惊才绝艳，如果说庞德等西方诗人对中国诗歌的倾倒还是稍嫌仓促的一见钟情，那么，西方学者（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入研究，则已经显示出他们对东方诗神确是在“上下而求索”，他们不仅注意到她的翠羽明珰、浓妆淡抹，而且还注意从她的眉尖颦笑看到心底波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取本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把本书称为《神女之探寻》。

西方汉学界在中国历史、经济等领域内的研究成绩早已为国人所瞩目，相比之下，他们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却较少受到国内同行的重视。毋庸讳言，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国内学术界的固步自封是一般的原因，但有没有可能是更为直接的内在原因呢？我认为有的。首先，文学研究，尤其是古典诗歌研究，在西方汉学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以美国的情况为例，虽然许多大学都设有中

国文学专业，但教授和学生人数极少（而且往往偏重在小说、戏剧方面），远远不能与中国历史、经济等领域的情况相比，投入的力量少了，其总体成绩当然也不会很大，这就不容易引起远隔重洋的中国同行的注意。第二，与其它人文科学相比，文学研究与文化背景的关系更为密切。西方学者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处理有关的资料和数据，从而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结构作出准确的分析。但是，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时，却会遇到一些很难逾越的障碍。中国古代的诗人绝大多数是士大夫，他们外儒内道的心态、亦仕亦隐的生活、亦庄亦谐的文风，都使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研究者们难辨真伪，莫分异同。同样，用方块汉字写下的诗歌所具有的特殊韵味，特别是那些难以言传的、须领略创作甘苦而后知的“韵外之致”，也使他们难以捉摸。所以，西方学者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时，就较容易产生隔靴搔痒或胶柱鼓瑟的缺点，即使是一些优秀的著作也很难避免。正是这些缺点使中国同行们偶尔浏览西方论著时往往不能终卷即束之高阁，而忽视了与这些缺点并存的精妙之处。

那么，编译本书的目的何在呢？或者说，本书所收的这些文章，对于国内读者有什么参考价值呢？第一，我同意史蒂芬·欧文在其序中所说的，每一种不利条件同时又可成为有利条件。由于西方学者处于与中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当他们研读中国古典诗歌时，就可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陷。比如说，我们读古诗时，对许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细节从不深究。而西方学者却一定要问个为什么，这种寻根问底有时会导致穿凿，但往往也会带来认真的思索和新颖的观点。再比如，我们常把前人的许多观点

视为定论，当我们读古诗时，常常有前人的意见先入为主，自己较少再作独立的思考。而西方学者或是不记得那么多的前人观点，或是虽有了解但并不视为定论，他们分析作品时就没有太多的框框，从而易于提出新的见解。第二，西方学者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和方法训练都与我们不同，这样，他们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就能在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借鉴。虽说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人引进西方的新方法颇为热心，但能够得心应手运用的似不多见。我想，与其停留在对新方法作一知半解的介绍，倒不如通过几个实例来看看别人到底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的。

鉴于以上的想法，我在编选本书时所遵循的准则是求异避同。有些文章写得相当出色，但观察角度和论述方式都与国内同行如出一辙，就只好割爱了。另外，限于篇幅，也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我对正文中的常识性介绍和注释中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引文出处作了一些删略。至于书中文章的是非优劣，须留待读者来评判，不用我在这里饶舌。假如读者读了此书之后更加体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训的正确，我将感到非常欣慰。

值本书问世之际，应该指出下列事实：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首先倡导编选本书，并在整个编译过程中一直给我以直接指点。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思教授及其研究生车淑珊女士、哈佛大学欧文教授都对本书的选目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欧文教授还及时地为本书写了序言。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尹禄光先生虽年近八旬，仍不厌其烦地校对了全部译文，从而使本书的翻译减少了许多错误。愿他们接受我由衷的感谢。

一九八九年二月于南京大学

目 次

序一·····	[美]史蒂芬·欧文 (1)
序二·····	莫砺锋 (5)

讽喻与《诗经》·····	[美]余宝琳 (1)
神女之探寻·····	[英]大卫·霍克斯 (28)
陶潜诗歌中的典故·····	[美]詹姆斯·海陶玮 (53)
后来者能居上吗：宋人与唐诗	

·····	[美]斯图尔特·萨金特 (75)
题画诗：苏轼与黄庭坚·····	[美]罗纳德·埃根 (107)

南唐词人冯延巳和李煜·····	[加]但尼尔·布赖恩特 (134)
姜夔对咏物词的追求·····	[美]林顺夫 (160)

中国诗歌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	[美]刘若愚 (193)
传统的叛逆·····	[美]史蒂芬·欧文 (211)
诗品解析·····	[美]布鲁斯·布鲁克斯 (240)
法则和直觉：黄庭坚的诗论·····	[美]阿黛尔·里克特 (271)
中国诗学中的才学倾向·····	[美]理查德·林恩 (286)

作者简介·····	(310)
-----------	-------

讽喻与《诗经》·

〔美〕余宝琳

关于讽喻和中国诗歌的探讨，必须首先考虑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及两千年来数量浩繁的《诗经》注解。现存最早的注本毛氏传本约成书于公元前二或一世纪，其中对于某些作品的解释肯定是“天真”的读者所料想不到的；有理由相信三部更早的、久已散佚的传本更是如此。用现代眼光看来未免牵强和迂腐的阐释传统，它持续性极强，甚至影响了朱熹等人。虽说朱熹声称要置前辈的一些观点于不顾，让诗表达它自己，以至摒弃了以往对若干篇目的合理注释，而代之以他独创的一些颇成问题的解说。

这个牵强而迂腐的传统被现代西方汉学家们称为“讽喻的”传统(并不合理)，并普遍地予以苛评。詹姆斯·莱格在其出版于1871年的《诗经》的第一个英译本中，舍弃了原诗的序说(作者未确定，曾有人认为是公元一世纪卫宏所作)，他认为“如果遵信序说，将使许多诗篇降为荒唐的谜语”，虽则他自己也难免受到其它一些“不可思议”的解释的影响。马塞尔·格兰纳特曾在1911年致力于一项研究，试图证明《诗经》305篇中的160篇“国风”与其说源于贵族，不如说源于民间，

● 本文译自《哈佛亚洲学报》第43卷第2期(1983年)。——译者注

并且是从各种各样的仪式和典礼而来。他同时宣称将摒除“所有那些象征式的或暗示诗人微言大义的解释。”^①他写道：“这种助长象征主义的偏见，学者感到他们束缚于此，就象被伦理学的专业框框所限，导致他们有时不得不作出显然是谬误的结论。”然而他也承认：“这些着眼于诗歌的讽喻性的阐释，透露了他们写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一种分类法则：这是对称法则、对应的运用。一个人只要了解此法则，他就能理解和诠释《诗经》。”^②亚瑟·韦利在其1937年完成的《诗经》译本的附录中指出，“讽喻的解释”曾被用于三分之一的诗篇中，这里主要是那些涉及求爱和婚姻的篇章，因为否则就不可能从中抽绎出儒家及其追随者认为它们包含的道德准则。虽然他同意格兰纳特的看法，即认为这种阅读方式歪曲了诗的“本质”，但也指出以这种方式对待《诗经》文句或文化并非绝无仅有，指出汉语一词多义性和社会活动的多重内容滋长了这种方式，并且它还导致以后的文学甚至日常言论中有不计其数的暗示和引喻。也许迄今对这一倾向最激烈的批评者要算王靖献了，他在1974年的研究中将《诗经》定为“口头词组诗”。他一开始就把矛头对着传统中国批评界的“以意逆志”之法，指出只关注作品的讽喻程度“显然是对这部古典诗集的曲解，是对《诗经》的发生特征和诗的原始定义的双重曲解。”王氏辩驳道，最早的关于诗的描述（见《尚书》）只将它与歌联系起来，而“绝不与伦理学相关涉”。讽喻派评注家无视歌谣固有的审美功能和文学内涵，却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某种深奥而隐秘的东西，在词句后面隐藏着许多教诲、批评或赞颂。”^③

关于中国诗的最早定义是不是只涉及纯粹的审美功能而“绝不与伦理学相关涉”，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加商榷。

而此处我不打算赘言。我所不能释然于怀的是，传统评注家理解《诗经》的方法在怎样的程度上能称之为讽喻化的批评，就象上述西方学者的见解那样。尽管寻求其答案难免要作些过于琐细的分析，但这仍然值得重视，这主要是因为《诗经》的评注文献所引发的理论与方法对后来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所起的作用，比《诗经》本身还要重大。

古代中国学者是怎样阅读这些歌谣的？我们先看看“国风”之首篇、也是最为有名的《关雎》，此诗诗题象其它一些诗题一样，直接取自开篇第一行的起首二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诗在形式上堪称是全体风诗的代表，由三个四字句的段落构成，每个段落四到八行。在自然意象的运用上，它也是典型的，即时时重复这些意象以引起每个段落的歌咏，不加任何说明即与人的处境相并置，当然人的处境是诗的重心所在。这种意象的运用被早期评注家命名为“兴”，并且被认作是《诗经》的三种修辞方法之一，这三种方法在后来的诗歌

中同样能见到。然而，“兴”的含义和作用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争端，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既然它为许多早期评注家所关心关注，我在下文中将很快地加以讨论。

第一位对这首诗加以评论的不是别人，正是孔子自己，在《论语》第三章中，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两条关于此诗的评语之一，另一条（见第八章）并不直接针对此诗。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由于受了儒家学派的影响，中国的正统批评才倾向于把《诗经》、甚至于全部文学当作某种道德熏陶和教海的材料。《论语》中若干关于《诗经》的短论中，有五条尤其集中在这部诗集的伦理意味和实用功效上：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第二章）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第八章）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十三章）

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十六章）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十七章）

换言之，《诗经》中的歌谣展示了一个道德传统（据说原有诗三千余首，孔子取其中一部分编成现在的集子。何以如此，恐不能无因），这使那些歌谣可被用作知识的源泉，言谈的格式，以及外交活动的指南。在两部早期的历史著作《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许多处于微妙的政治场合下赋诗言志的情形，这可证明诗曾被视为具有实用的传达讯息价值。侯思孟认为上引《论语》第二、第五条中的“兴”字，实际上应是指引《诗》句以证己意而言^①。确实有理由相信，这类先例与早期评注家

从事道德性的阐释，不无因果关系，因为它们不仅说明了歌谣的功用。而且还暗示我们应找出诗的功用所在，这样才能理解诗的“兴”义。

然而，怎样通过诗的“兴”来确定诗的实际功用，学者中有着很大的分歧。以《关雎》为例，孔子只是欣赏其感情适中，最早的一派评注家却视之为政治批评。在第一位系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中，有两段含义大致相同的文字涉及此诗：“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⑥有评注家解释说，此诗表现的是男女礼仪的正面形象，以此来讽刺康王及其夫人的举止不端。司马迁的见解显然受到鲁诗的影响，这一诗派曾经久不衰，影响所及，直到范曄的《后汉书》中仍可找到相同的见解。

这种解释显然是有问题的，不仅因为《关雎》的诗句中没有任何讽刺意图的暗示，而且司马迁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也没有为这种批评提供什么印证：在他笔下，康王统治时期没有任何缺陷及衰败的记载，相反却是天下安宁，以至于刑罚废弃达四十年之久。也许是因为觉察到司马迁的看法有这些难通之处，所以稍后兴起于汉代而颇占优势的另一派注释传统把《关雎》看作是一首赞颂诗，特地来赞颂周王朝的缔造者周文王的王后。

这种解释始于现存最早的《诗经》校订本中的、历来认为是毛亨和毛萸所作的注解，他们最先将引起下文的关键物象标明为“兴”，并将这首诗里的“兴”释成某种含有目的意味的类比。在指出“关关”是鸟的和鸣声以及这种鸟遵守雄雌有别之道以后，毛氏继续对诗的开头两句评论道：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

雌雉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毛氏对第三、第四句的注解仍把“淑女”当作是文王的王后，她幽处隐居，是统治者的良伴，因而“有关雎之德”。到了第二节，毛氏指出正是她在采集可食用的水中植物：因为她“有关雎之德”，所以她能为宗庙之事准备供物（《正义》卷1）。（显然，她的形象已从其令人赞美的隐处幽居之中浮现出来。）

此诗的序（一般认为是卫宏所作，并通常刊于毛传本内）基本上采纳了这种理解：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而且，《诗经》第一组诗“周南”中余下的十首诗的诗序，都认为这些诗是描述王后（有两处是文王的）美德之影响的某些方面。序作者在这里是要以主题或类似叙事结构来组合某一地区中的诗篇，他的这一意图在这部诗集的其他部分也多次出现过。

仅一个世纪以后，为毛传作笺注的郑玄就已对《关雎》的这一解释作了一番有趣的歪曲。在他看来，“淑女”不是指王后，而是被品德高尚、无忌妒之心而安于幽居的王后找来共佐君王的宫女们；因此，是王后为了寻找她们才“辗转反侧”。为毛传郑笺作疏的孔颖达将传、笺、疏汇在一起出版，他对郑玄的补充意见作了详尽的阐释（《正义》卷1）。

然而，这件事没有就此了结。当宋代学者朱熹致力于《诗经》研究时，虽然他对其中许多诗篇提出新解，但对《关雎》一